

Cooper 八问方案国内外研究综述*

牛佳 林晓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58)

提 要: 本文为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LPP)领域经典理论 Cooper 八问方案的综述,该框架在 LPP 领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这一学科注重语言活动的现实意义,因此该学科理论构建的过程较为缓慢。目前对八问方案的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对其理论阐释的层面,一些学者的后续研究针对八问方案中的不同变量,分别给出进一步解释,增强了各变量对语言规划活动的分析力,发展了该框架。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运用该框架进行案例分析,本文将从对该框架进行理论发展和使用该框架作案例分析两方面加以综述,以期对未来该理论的应用提供帮助。本文指出,八问方案是一个描述性的框架,语言规划与政策领域发展至今的理论框架都无法摆脱描述性的特点,对于语言规划过程以及语言行为规律的描述依然是该领域研究者的主要任务。

关键词: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 八问方案; 理论发展; 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20)03-0106-7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20.03.017

Review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about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Niu Jia Lin Xiao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which is a classic theory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LPP).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language activities is emphasized in the discipline, s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rocess is relatively slow. Currently, most of the researches are still merely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is framework. Some scholars' researches provide further explanations for different variables in the accounting scheme, thus the analytical power of each variable in language planning activities is strengthened and the framework is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cholars applying the framework into case study. The paper reviews the framework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and analytical case studies, aiming to provide inspiration to further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points out that accounting scheme is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and frameworks in LPP have the same de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 Description of regularities of language behaviors and 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es still remains as the main task of LPP researchers.

Key words: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LPP); Accounting Schem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case study

1 引言

语言规划活动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对于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发展。最初,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仅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致力于解决一些新独立国家存在的社会语言问题,语言规划也经历从认同为国家选择一门共同语到意识到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这一转变。语言规划这一学科注重语言

活动的现实意义,因此该学科理论构建的过程较为缓慢。王辉(2013: 16)提出,语言规划并不是一个理论驱动的学术研究领域。

不过一些学者也尝试构建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对语言规划理论进行有益的探索,Cooper 的“八问方案”(Accounting Scheme)或名“变量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自 Cooper(1989)提出八问方案以来,该框架在 LPP 领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 作者电子邮箱: niujia96zju@163.com(牛佳)

但目前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对其的理论阐释层面 (Spolsky, Shohamy 1999), 一些学者的后续研究则针对八问方案中的不同变量, 分别给出进一步解释, 增强各变量在语言规划活动中的分析力, 发展该框架。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运用该框架进行案例分析, 本文将从对该框架进行理论发展和使用该框架作案例分析两方面加以综述, 以期对未来该理论的应用提供帮助。

2 八问方案的提出

20世纪70、80年代, 研究者试图区分两种不同的语言规划活动, 一种与调整语言本身有关, 一种与调整语言使用的环境有关, 前者被称为本体规划, 后者被称为地位规划。学术界在数年里, 试图界定语言规划过程的组成, 如Haugen (1983: 269-289) 提出语言规划的过程理论, 语言规划的基本步骤包括语言的选择、编典、实施和完善。Haugen的2*2矩阵框架将语言规划分为社会(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两个维度, 社会维度包括语言的选择(即决策过程)和语言的实施(即教育推广过程), 语言维度包括编典(即符号化、标准化过程)和完善(即功能发展过程)。该模型还可以从语言的形式(政策规划)和语言的功能(语言培育)两个角度分析。

尽管Haugen的矩阵框架对理论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 但该模型只是提供一个在理想状态下, 关于语言规划过程的较好的概述。根据Haugen的模型, 语言规划过程总是从一个有关地位规划的决定开始, 而事实却不一定是这样。Cooper认为, 当时的语言规划研究尚未存在得到普遍接受的框架。Cooper (1989: 57) 指出, “语言规划目前仍然处于发现行为规律的阶段, 在我们能够发现规律之前, 我们必须首先决定用什么变量来描述语言现象是有用的”, 于是他提出一个更关注语言规划过程的描述性理论框架。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一直是跨学科领域, Bastardas-Boada (2013: 363-381) 指出, 该学科存在的危险之一就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活动时, 采取一种支离破碎的视角 (fragmentary perspective)。为更全面地理解语言规划活动, 借鉴其它学科或次学科的框架是必要的且势在必行的, 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语言规划, 还可以提出适合的理论框架。Cooper在借鉴革新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权力论和决策论后, 制定出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八问方案”。

革新管理学研究新现象如何传播扩散, 考虑

的因素是谁采用了什么、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出于什么原因、如何采用? 针对创新传播的研究, 尝试解释人们接受创新的程度以及速度的不同, 这些研究从创新的特点、它的采纳者以及其社会环境等方面做出分析。Cooper (1979) 认为这种传播论的方法可用于语言规划的研究中, 用于解答以下问题: 谁于何时何地采纳什么, 出于什么原因以及采取什么方式?

Cooper认为规划语言跟市场营销有很大相似性, 包括前期调研、后期宣传和推广等, 且都强调正确的时间、地点和对象。市场营销面临的典型问题是“开发恰当的产品, 配以合适的推广手段支持, 将该产品适宜的价格投放在正确的地点” (Kotler, Zaltman 1971: 3-12)。在大多数情况下, 即使是国家层面支持的语言规划机构, 也需要像市场营销者一样, 考虑如何创造出一种氛围来支持所规划的语言行为。而在“语言产品”上的花费也是影响其吸引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比如, 经济因素成为许多人学习英语的主要动机之一, 当人们认为获得的经济回报会高于花费的培训费、时间精力等, 人们就会接受学习英语。

权力论中指出权力是一种可以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权力在人际关系中无处不在, 因此不只是政治科学家会研究权力。语言规划也是一种试图影响他人行为的活动, 因此权力论的框架也可用于语言规划研究: 有影响力的人即精英, 从语言决策中能获得什么利益, 如何获得这些利益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决策论则主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达成决策的动机有哪些, 二是决策是如何达成的。Edwards和Tversky (1967: 7) 把决策论定义为“以有序的方式描述影响选择的变量的一种尝试”, 那么有两种决策分析的传统: 规定型 (prescriptive) 和描述型 (descriptive)。在描述型决策理论中, 至少存在3方面关注点, 即做出决策的个人、组织以及决策制定和实施的场所。Cooper扩展Dye和Robey (1980: 3) 关于公共决策分析的框架, 并运用于语言规划分析中, 用以解决以下问题: 谁做出什么决策, 为什么, 以何种方式, 在何种条件下, 以及产生什么结果。Cooper (1989: 58) 将其应用到语言规划领域, 把语言规划视为: (1) 创新管理; (2) 市场营销案例; (3) 一种获取和维系权力的工具; (4) 作决策的案例。

3 八问方案的具体内容

八问方案的具体内容为: 规划者是谁; 试图影响什么行为; 目标人群是谁; 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以什么手段以及其决策过程是怎样的;最终达到怎样的效果?(Cooper 1989: 97) Cooper 将语言的规划者分为精英阶层、有影响力的人、反精英阶层以及非精英阶层的政策执行者(同上: 98)。这一分类借鉴 Ellsworth 和 Stahnke(1976)对3类政策决策者的区分:精英阶层是被官方授权可以制定政策的人,如总统、议会代表、校长、老师等;有影响力的人是社会中有特权的群体,他们可以提出建议、甚至通过威胁等手段影响政策的制定,但并不做决策;有权威的人是真正做出决策的人,他们有时由精英组成,有时由有影响力的人组成,有时又是两者相结合。要回答谁是政策制定的主体这一问题,需要根据不同层级的政策、视具体情况而定。在一种情况下的政策实施,可能在另一种情况里就是政策本身。比如说学校为实施某项国家层面的政策,选取某一种教材,这一行为可看作实施该政策的系列措施之一。而对于教师来说,教材选择这种行为属于学校层面的政策。

语言规划试图影响的行为可以分为结构、功能和使用水平这3方面:结构(即语言)层面,如同化,对于语言形式本身的规划属于本体规划的范畴;目的(即功能)层面,也就是所规划行为为何使用,对于语言功能,即语言使用的规划属于地位规划的范畴;以及预期被采用的水平,即在意识、评估、熟练度以及使用方面的情况,对于语言习得水平的规划,Cooper(1989: 157)将其称为习得规划,用于指代有组织地促进某种语言学习的行为。

语言规划的目标人群这一变量首先需要分析目标人群的类型,正如创新的采纳者可分为个人或组织一样,有时语言规划主要针对组织机构,美国的“简明语言运动”即是一例;有时则通过针对组织机构进而影响个体行为,这样的“两步走”规划在美国“女权运动”中较为显著,女权运动者试图改变一些专业机构的编辑方针,于是像“美国心理协会”这样的组织曾一度声明,他们的期刊将不会发表使用性别歧视用语的文章。其次,还需要区分语言规划的主要目标或中介目标,在“女权运动”中,出版方或专业组织只是该运动的中介目标,运动最终目的是为了影响个体的语言行为。除此之外,还需要分析目标人群习得规划行为的机会、目标人群学习或使用规划行为的动机以及目标人群可能拒绝规划行为的动机。

语言规划分为显性目的和隐性目的,显性目的与语言行为紧密相关,包括但不限于保持语言的纯洁、使某种语言复活、对某种语言进行改革或

标准化、学科术语或科学术语统一、词汇发展及字体简化等。隐性目的则指一些受到变革影响的非语言行为,如某些个人或群体利益的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须的身份认同、减少文盲提高大众文化水平以及发展经济与科学技术等。

语言规划的条件是指语言变革的背景。Cooper(1989: 93-96)综合借鉴 Leichter(1979)以及 Ellsworth 和 Stahnke(1976)关于影响或决定政策制定条件方面的研究,将语言规划过程中的条件分为情境条件(situational conditions)、结构条件(structural conditions)、文化条件(cultural conditions)、环境条件(environmental conditions)、信息条件(informational conditions)。情境条件多指时事,即当时发生什么。结构条件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的类型,以及社会、人口和生态的类型。文化条件包括制度规范、文化规划、权威的社会化。环境条件指来自该系统外的影响,如国际环境等。信息条件涉及在做决策时所需的数据。

推进语言政策采取的手段可以是权威、强制力(force)、宣传和游说等。政府当局可将语言政策以法律条款的形式写进司法,如我国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除此之外,在社会上构建良好的舆论及语言学习氛围也极为重要,如我国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至今已举办20届。在殖民或托管时期,殖民者或政府有时采取强制力的形式推进语言政策,如英国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期间,承认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为该地区的官方语言。

Cooper 将政策的制定过程分为4个阶段:对于存在问题的确认,对于政策的前期商议、政策规划、政策合法化及采纳政策。如民国初期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国家存在着人民文化水平低下的问题,于是组建“读音统一会”“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等,以期通过“国语统一”来减少文盲率。研究会的解决方案如“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通过教育部颁布后全国通行,获得政策的合法地位。

4 国内外对于八问方案的研究

对于八问方案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理论发展和案例分析两种,理论发展又可细分为对框架进行整体诠释性发展和对框架中某一变量进一步发展两类。

Spolsky 和 Shohamy(1999: 35)即是对八问方案的整体性诠释,他们延续 Cooper 的思路,从3

个不同学科(社会语言学与语言规划、政治学和政策研究,教育与教育语言学)的角度对 Cooper

的八问提出概括性解释,试图为八问中除目的和手段外的六问提供答案。

表₁ Spolsky 和 Shohamy 对 Cooper 八问方案的诠释

变量/学科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规划	政治学和政策研究	教育与教育语言学
谁? (行动者、发起人、规划者、政策制定者、权威人士)	语言复兴者、种族首领、语言机构	压力集团、利益集团、社会力量、政府各层、国家	教育政策制定者、中央、地方、当地教育领导者
做什么? (行为和过程)	规划语言的地位, 编典语言的本体	遵循政策制定顺序	选择要教的语言, 决策使用的资源
为谁?	语言群体和说话者	种族群体、多数和少数民族	教师和学生
为什么?	维持或改变优势语言的, 重视经济需求, 表达意识形态	颠覆或维持平衡, 想赢群体压力, 表达意识形态	教育
在什么条件下进行?	现有的交际种族志或语言的所有组成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教育系统
有什么影响? (规划的和未规划的)	语言维持, 语言转变, 语言现代化	影响、效率、综合影响	考试结果、学术成就的水平、综合影响

对表₁中每一个问题的思考,将使我们对于语言政策的本质有更全面的理解,并且更好地将语言政策与一般的语言实践区分开来。Spolsky 和 Shohamy(1999: 37)认为,事实上语言规划者“必须有影响使用某种语言的人”,那么在社会语言学领域的代表群体有语言机构、语言复兴者等,在政策研究领域的代表群体有国家、国际政府和社会力量等,而在教育领域,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各级教育的领导者都可以是语言政策的规划者。一项成功的语言政策需要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使现存的语言实践转变为预期的语言实践,同时将语言使用者以及他们对于调整其语言行为的意愿考虑在内。教育领域一直都是语言规划与语言推广的主战场,因此 Ferguson(1977: 12)指出,规划语言功能时最关键的决策,就是选择教育系统里的教学媒介语,这也往往是政治压力和国家政府决策的中心。所以在研究语言规划活动时,语言的教育政策也值得关注。

针对八问方案中的“规划者”“规划动机”“规划过程”等变量,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领域的学者也做出进一步推进。“规划者有可能是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变量”,Baldauf(1982: 1-6)是最早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之一。Cooper(1989)对规划者这一变量进行简单分层,Kaplan 和 Baldauf(1997: 6)把规划者进一步细分为政府机关、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而在实际操作时,如何区分不同

机构或组织所属的范畴,这一分类标准并不明确,并且同一组织分属不同范畴的情况也是存在的。Linn(2010)则认为,重要的是区分不同的呼声(voices)而不是规划参与者(actors),因为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体会有不同的呼声,而即使是同一个规划者,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持有不同的观点。语言政治辩论中的“呼声”这一概念是当前用于分析辩论中不同观点的一种手段。

Ager(2001: 7-12)将 Cooper 八大变量中的“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解构为语言使用与规划的动机(motives)、对待语言的态度(attitudes)以及语言规划的目标(goals)。这3者组成动机过程,动机类型与态度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紧密相连,而目标理论可以解释政策的动机过程,语言规划的目标可以分为3部分:长远的理想(ideal),更为实际、较可能实现的谋略(objective),更确切的短期指标(target)。Ager(2005: 31)指出,“是什么驱使规划者做出规划,为什么行为受到影响的人应该愿意服从这些操纵?这里的‘为什么’比 Cooper 八问方案里的‘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稍微复杂一些”。

结合 Kaplan 的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八问方案”中的“语言政策制定过程”这一变量,Kaplan 指出语言政策的制定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Kaplan 1989)。“自上而下”是指政策由政府当权者作决策,而政策实施的目标群体的意见在此过程中几乎不被重视。“自下而

上”是指政策商议过程中收集民众的意见,根据学习者和使用者的反馈对政策进行修改或完善,制定出更易于接受的语言政策。黄晓蕾(2013: 34)认为,“在政权强大、社会安定的时期,语言文字改革主要由官方及其授权机构来制定并向整个社会推广,即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行为;反之,语文改革则会成为民间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关注和从事的活动,由民间力量发起、推广并最终获得官方的关注和认定,即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行为”。现今语言政策的制定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问题的发现、政策的制定可由政府发起,而民众的意见也被充分地重视。挪威政府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8 年发布的语言政策报告即是一典型的案例(Linn 2010)。对语言规划中决策过程的分析可分为两类:对提出问题或制定目标的决策过程分析,以及对解决方案或采取手段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前者针对提出问题,后者针对解决问题。

除发展理论框架外,国内外一些学者也开始使用该框架作案例分析。Bermel(2007)详细阐释捷克于 1400 年至 1900 年、1900 年至 1980 年的两次拼写改革,以及 1980 年至 1994 年的正字法改革。在此之前,他借用 Cooper 的“八问方案”,分析一场拼写改革由哪些因素组成。分析中首先指出,拼写改革中的规划者代表着不同个人与多个组织的意见和利益,这与“八问方案”的分类相一致。此外,Bermel(2007)特别点出 Cooper 关于规划条件的分类中值得注意的地方,“八问方案”中给出的条件分类在实际分析中并不是所有条件都需要涉及。比如,环境条件指的是当地或国际语言的盛衰带来的影响,但在阿塞拜疆文字改革的案例中,英语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尽管英语的主导地位对于其他语言规划活动影响重大。除此之外,影响语言规划的环境条件还包括国外一些教育上或学术上的潮流,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语言规划活动需要回应并反驳一些研究,如国外(尤其是美国)发展起来的有关捷克语言状况的新观点。作者认为,Cooper 的理论框架对于概述拼写改革进程中的不同影响因子(contributors)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面的信息才能够更详细地解读每个变量涉及到的方面,“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领域近年来的研究重心已从规划过程分析转变为规划背后的假设(assumptions)分析”(Bermel 2007: 24)。例如,要想详细解释八问方案中的“目的”变量,可结合 Ager 的动机理论,Ager 的理论框架对于研究拼写改革及其反响

则很有帮助,因此作者在案例分析时综合使用这两个理论框架。

Zhao 和 Baldauf(2008)基于“八问方案”对比分析 1986 年前后中国汉字规划活动的异同,将中国 1986 年前后汉字规划活动根据八大变量的内容,放置在八问方案框架的表格中。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语言规划出现的多种变化,包括规划者由多为政府机关主导转变为官方、半官方以及学术机构,试图影响行为由降低文盲率转变为人机互动,规划条件由典型的农业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规划手段由大规模激进的政治运动转变为机构倡导,语言决策过程由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转变为更加民主、透明的自下而上。但对于变化特征不明显的变量如语言规划的目标群体,以及难以测量的变量如语言规划的结果,该框架提供的解释或回答显得模棱两可。

国内使用该框架作案例分析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用该框架研究文字改革,并分析改革成败的原因,如 Pan 等(2015)以“八问方案”为组织框架,梳理 20 世纪中国汉字改革的 3 个主要阶段(即建国后的 3 次汉字简化运动)。为解释不同阶段的汉字改革的成败原因,该文还采用 Ager 的 7i 模型着重分析不同阶段存在的不同动机及其对改革成败产生的巨大影响。刘佳(2011: 125 - 126)也根据“八问方案”框架分析中国建国后的第二次汉字简化运动,探讨该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以及留下的经验教训和启示。文中对“什么样的实施者、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手段、取得了什么效果”这 4 个变量,进行“简化运动前期、简化运动后期”的分阶段对比。

另一类是将该框架用于语言教育政策领域,使用该框架做历史发展梳理,探究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如李娅玲(2012)运用“八问方案”深入研究中国 20 世纪以来的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该研究以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历史背景,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培养目标、教学法与教材、师资情况等方面,揭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存在的问题。李娅玲(2012: 67)认为要评估一项外语教育政策是否有效,首先要对各个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进行分析,看其组成部分是否民主、科学,外语教育一线教研员和教师是否有话语权,是否有学生表达心声的渠道与机会等,这是对八问方案第一个问题(谁是政策的制定者)的回答。与此同时,在此基础上她概括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中的

社会环境因素,以及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所依据的人的发展规律、语言发展规律和外语教学规律,构建4个决策要素互相作用下的理论分析框架。李瑞(2011)基于“八问方案”分析框架分析清末以来不同时期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特别是英语教育政策与规划。文中通过分析政策与规划的内容、制定和实施过程,论述其影响和存在的问题。该文验证Cooper的语言规划“八问方案”的适用性,即可以用于分析中国国情下的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不过更侧重从语言教育的角度出发。

5 八问方案的评价

“八问方案”中列出的8个变量涵盖语言规划过程中一般会涉及的8个要素,而在使用“八问方案”作为理论框架进行案例分析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或增减。

王辉认为,“该分析模式列出的8个变量是语言政策与规划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有利于从多个角度理解语言规划行为”(王辉2013:19)。李娅玲(2012)也认为Cooper的分析框架是揭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行为的有效工具。Ager评价“八问方案”中包含了LPP研究的八大变量,但“为了能够充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些其他学科的理论背景。其中一些很显然是社会和环境相关的,包括社会社区的类型,社会的本质以及语言规划发生的场所,即经济文化环境。其他一些相关学科更偏向政治方面,与政治行为相关、规划和政策体系、决策过程等”(Ager2005:9)。例如,1993年的《威尔士语言法案》设立了威尔士语言委员会,致力于推广威尔士语,并使其获得与英语同样的地位。它将推广的主要精力放在私企这一领域,但许多企业的总部并不设在威尔士,这一现状长期以来都令人担忧,因此要更好地解释语言规划现象,须结合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基于此例,Ager进一步区分形象规划(image planning)和声望规划(prestige planning),前者是身份建构和巩固的一个阶段、更为长期、较理想化,而后者是对态度的变革,是短期的、以政策为导向的。

Moore(1996:473-497)认为,八问方案在理论层面存在两方面缺陷:第一,该框架是纯粹描述性的图式概要,无法解释澳大利亚重大语言政策变革的原因^①。第二,对于“是否可能构建一个语言规划的理论”这一问题,Cooper也给出模糊的答案,“这样一个理论不是目前的能力水平所能及的”。而在实践应用层面,该框架存在矛盾性、任意性和循环论证的问题(contradictions, arbi-

trariness, and circular argument)。Cooper建议使用“交叉验证”(cross-verification)来证明每项描述的有效性。Cooper认为,八问方案中的变量有助于研究者从无数的事实中选取所需的内容,但Moore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不采用其他的选择标准,这些变量也只是永无止境的事实罗列而已。

不难看出,Cooper的八问方案开始注意到对规划者的分层问题,根据是否有权利制定语言政策、能否影响语言政策的制定等标准,将语言规划者分为精英、有影响力的人、执行者等,但并没有进一步对每一群体进行具体的界定。同时,八问方案也没有区分政策制定过程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即没有关注到政策的目标群体也有可能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这一现象。Cooper指出,“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一个令人满意的语言规划理论的出现需要等待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变革理论的出现”(Cooper1989:187)。正如Cooper承认的那样,八问方案是一个描述性的框架(同上:97)。因此,其解释力一直是批判者质疑的焦点,上文中提及的使用该框架作案例分析的研究,也多将该框架与其他框架结合后使用。但何为描述性,如何界定描述性等问题尚未得到解答,语言规划与政策领域发展至今的理论框架都摆脱不了描述性的特点,对于语言规划过程以及语言行为规律的描述依然是该领域研究者的主要任务。

注释

①该变革是指澳大利亚的《国家语言政策》(the 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简称NPL)于1991年被《澳大利亚的语言:澳大利亚语言与读写能力政策》(Australia's Language: The Austr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cy Policy)替代。

参考文献

- 黄晓蕾. 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Huang, X.-L. *A Study on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3.
- 李瑞. 清末以来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 || Li, R. *A Study 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D].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5.
- 李娅玲. 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Li, Y.-L. *A Study on the Develop-*

- 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刘 佳. 重新认识“二简字”——利用库普尔的八问方案探索第二次汉字简化[J]. 青年文学家, 2011(2). || Liu, J.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Second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alysi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J]. *Youth Liberator*, 2011(2).
- 王 辉. 语言规划研究 50 年 [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 || Wang, H. Review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Past 50 Years [J]. *Journal of Beihua University*, 2013(6).
- Ager, D.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M]. Clevedon: Cromwell Press, 2001.
- Ager, D. Image and Prestige Planning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1).
- Baldauf, R. B., Jr.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American Samoa: Planners, Plans, and Planning [J]. *Language Planning Newsletter*, 1982(1).
- Bastardas-Boada, A.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owards a Complexity Approach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13(3-4).
- Bermel, N. *Linguistic Authority, Language Ideology, and Metaphor: The Czech Orthography Wars*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7.
- Cooper, R. L.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Spread, and Language Change [A]. In: James, E. A., Richard, T. (Eds.),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 Table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C].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Cooper, R. L.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Dye, T. R., Robey, J. S. “Politics Versus Economics”: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on Policy Determination [A]. In: Thomas, R. D., Virginia, G. (Eds.),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Policy* [C].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0.
- Edwards, W., Tversky, A. Introduction [A]. In: Edwards, W., Tversky, A. (Eds.), *Decision Making: Selected Readings* [C].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 Ellsworth, J. W., Stahnke, A. A.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ystem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 Ferguson, C. A. Sociolinguistic Settings of Language Planning [A]. In: Rubin, J., Jernudd, B. H., Das Gupta, J., Fishman, J. A., Ferguson, C. A. (Eds.), *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 [C]. The Hague: Mouton, 1977.
- Haugen, 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us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 In: Cobarrubias, J., Fishman, J. A. (Eds.), *Progress in Languag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C]. Berlin: Mouton, 1983.
- Leichter, H.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Policy Analysi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Linn, A. R. Voices from Above—Voices from Below: Who Is Talking and Who Is Listening in Norwegian Language Politics?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10(2).
- Moore, H. Language Policies as Virtual Reality: Two Australian Examples [J]. *TESOL Quarterly*, 1996(3).
- Pan, X., Jin, H., Liu, H. Motiv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Simplification [J].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015(1).
- Kaplan, R. B. Language Planning vs. Planning Language [A]. In: Candlin, C. H., McNamara, T. F. (Eds.),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mmunity* [C]. Sydney: NCELTR, 1989.
- Kaplan, R. B., Baldauf, R. B. Jr.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 Kotler, P., Zaltman, G. Social Marketing: An Approach to Planned Social Change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71(3).
- Spolsky, B., Shohamy, E. *The Language of Israel: Policy Ideology and Practice.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 Zhao, S., Baldauf, R. B. Jr. *Planning Chinese Scripts: Reaction,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M].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定稿日期: 2020-04-02

【责任编辑 陈庆斌】